

引 论

对旅游和旅行进行社会学分析是比对空闲时间进行社会学分析更加晚近的事情。闲暇社会学的最初研究始于社会学本身呀呀学语之时。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旅行，但旅游的概念直到 18 世纪末才在英国被创造出来，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习俗和价值观的变动之中。将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则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劳动者得以将他们的带薪假期用于度假和旅游，从而出现了大众旅游现象之后的事情了。

搜寻人类的记忆可发现，在古代，纯粹出于好奇心而出外旅行者，我们或许只能找到希罗多德^{〔1〕}和保萨尼亚斯^{〔2〕}。色诺芬^{〔3〕}的《远征记》只是一个急于回到雅典附近重新掌管自己财产的雇佣兵在漫长的退却路上的日记罢了。照加斯东·帕里斯^{〔4〕}的说法，出于娱乐和增长学识的目的而旅游，仅始于中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出现了马基雅弗里、布吕内托·拉蒂尼、彼得拉克、富尔图纳等人。

帕里斯引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帕斯托尔的话说,消遣的旅行只是到了 16 世纪,而且只是在意大利才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印刷的旅行者的书籍,这些书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属于出版量最大的书籍。此外,还出现了关于旅行的思考 例如蒙田^[5]的著述或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精心写作的论文《论旅行》(1612 年),他认为,旅行应当包括在年轻人的教育和老年人的经验之中^[6]。

到法国和意大利去的英国旅行者,以及随后的欧洲人和北美人,使旅游的概念具有了广度,而这种现象首先是在经济学的范围内被加以研究的^[7]。然而,尤其是在德国,很快出现了一种研究人员流动的科学,这后来发展成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最早旅游社会学专著发表于 1935 年 罗伯特·格鲁克斯曼既未把旅游说成是人员的过境,也未把它说成是一种探险或事务性的旅行,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与人际关系和人类的交流相联系的社会现象^[8]。

此前,莱奥波德·冯·魏斯就在乔治·齐美尔^[9]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旅行者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外国旅行者不是公民,不仅与政治无关,而且不过问政治,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受到欢迎。简言之,在很长时间里,旅行者都是一个

调查者，他有时会受到敌视。自 19 世纪末起，他成了被调查者。此后，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旅游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1980 年）的起草者们就承认了这一点：“自从劳动者被赋予带薪休假的权利，使得旅游从精英分子娱乐的有限范围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范围后，旅游便具有了广泛性，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是恰当的和必要的”（宣言 A，第 2 点）。

从历史上说来，最初是依据直接从旅行史及关于自由支配时间和休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借用来的问题和方法，尝试着确定旅游和旅行社会学的框架的，后来这一学科还得益于旅游地区和区域整治（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以及旅游产品和服务营销（市场推销和市场需求研究）方面为取得实际成果而进行的经验主义的运筹研究。

因此，对旅游有着多种社会学解读。这些解读使分析更加复杂。正如阿尔图尔·奥洛^[10]所指出的那样，旅游是“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形式之一”。这样说来，除了简单地阐明各种概念和理论外，重要的是表明，旅游社会学涵盖了诸多领域：福利和生活环境、文化、交通、社会群体、发展、不同社会的相遇、个人心理学、影响研究或市场研究、劳动时间的安排

等等。此外，由于旅游所具有的多样性，分析不同社会不同的模仿方式及其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尽管已经有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和不少的论文、报告和计划，旅游和旅行社会学仍有待建立。迄今为确定旅游的社会学定义及其运行模式所作的尝试，主要依据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其价值尚待证明，何况这些尝试都没有离开帮助个体、集体或公共的旅游机构推销出更多唯利是图的旅行的考虑。

M. - F. 朗方⁽¹¹⁾在评述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参照范围时，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除了理论上的不相适应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造成的障碍外，这一参照范围——即与市场有关的问题——还赋予了社会学以一种特殊的职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闲暇社会学的方法，它把旅游作为空闲时光的一种特殊活动来对待，并把旅游活动作为闲暇活动，即一种服从个人选择的逻辑的活动来分析。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尽管闲暇社会学努力把闲暇放到工业社会的演变之中进行研究，但它却往往低估了旅游业对空闲时间消费的影响，也看不到将时间用于旅行所带来的意义变化。”

因此，旅游社会学正通过一种整合和区分的过程趋于形成。它首先区别于研究旅游和旅行时所使用的一系列人文科学的学科(史学、人种学、法学、经济学)。

它还试图将自己的贡献整合到一个既是共时性又是历时性的体系之中,如果可能的话,这一体系将提出一些关于旅游主体的行为及旅游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的普遍原则。然而,理论的情况变化很快。旅游社会学和下述学科之间的分界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即:(1)以关于收支和时间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社会学;(2)从民意和心态调查中汲取基本材料的闲暇社会学;(3)与劳动时间安排相联系的劳动社会学。

总而言之,旅游社会学与社会学这种较晚出现的学科的境况相同,按照阿兰·图雷纳的说法,社会学的“形成很困难,因为它应当把过去关于超社会现象的论说吸收过来,而不是用虚假的实证方式加以否定”。社会学的名称是 A. 孔德起的,他放弃了最初想到的社会心理学的名称。除了法国的迪尔凯姆外,意大利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社会学的另一名创立者,而他同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逻辑和理性的活动的科学,而社会学则是非逻辑的活动的科学。

还应注意,社会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语言。例如,在形式社会学之父乔治·齐美尔看来,社会学的目的是研究由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形式。在韦伯看来,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从历史

比较中显现出的规律性。韦尔纳·松巴尔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科学。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尤其是在闲暇社会学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最早的社会学家们则认为，应当对某些既重要又不为人所了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作尽可能准确的描述。

迄今为止，对社会学仍难下一个定义。种种制度方面的原因解释了经验社会学，亦即调查社会学，往往是微观社会学，而不是宏观社会学，因此，宏观社会学所走的是一条思辨的道路。然而，正如雷蒙·布东所指出的，“在社会学中很少能够找到本来意义上的理论的例子。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一种理论，往往或是一种简单的归类，或是一种概念系统，或是一个说明两种现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命题，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体系，即一种学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许多领域里社会学研究成果，其描述性或思辨性的倾向所带来的影响，”^[12]。

因此，旅游和旅行社会学的目的不可能在一个定义中加以表述，而只能通过批判，通过直接分析旅游和旅行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来加以说明。在此情况下，对旅游的思考将不会脱离社会分析的复杂性，“不会脱离社会学的重负，就好像它是同社会结构相重迭而发展似的”（M. - F. 朗方）。

最后，在这篇引论中，还应当强调指出社会学家在他同旅游负责人的决策和权利的关系中所处的尴尬境地。诚然，社会学家确实越来越多地受到咨询，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不时被忽视，被回避，而其结果就是掩盖了旅游对社会提出的问题。

第一章 假期,旅游的时节

一 劳动时间,假期和带薪休假

1. 争取到带薪休假。自有人类便已出现的旅行,只是在旅游这一现象中才同自由支配时间和闲暇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闲暇表示了富裕的自由人的地位,命运使他们不必参与劳动,而他们也正因如此必须担负起道德、民事和政治方面的重任。

“空闲时间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让大家有空闲是宽容大度的表现,而空闲不是以时间,而是以使用时间的的方式来衡量的……在空闲时劳动与公民身份不符,它体现了一种贪财的利己主义;这就是平民阶层可恶的不问政治的倾向。闲暇和自由时间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为了、并由于一种政治思想而存在的,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并确定了什么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什么是不可以自由支配的……因此,没有空闲的就只

有那些出身贫寒，没有希望获取政治上的显贵头衔的人了^[1]。

在古代的社会，或农业社会，或中世纪历史时期的社会里，劳动和闲暇是通过习俗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些习俗使人们得以参加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去^[2]。这两种活动，尽管目的不同，但是在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中，却有着同样性质的意义：节日包含了劳动和娱乐，并且遵循着一种自然的节奏，即季节和时光的节奏。于是，节日往往成了大量消耗食物和精力的机会。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如果不是反面的话

在筹备世界旅游大会（1980 年）时，就曾多次有人指出，直至 20 世纪中叶，旅游一直是既拥有时间又拥有购买力的上层人物才能从事的活动，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而这正是社会地位高的标志和象征。旅游成了这些人炫耀消费的场所^[3]，正因如此，上世纪末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豪华的大饭店、温泉疗养地和滨海疗养地。随着带薪休假的社会措施的实施，正是模仿现象和不可避免的都市化造成的需求，导致了大众旅游的出现。20 世纪初，给公职人员和公共部门职员以带薪假期的通常做法^[4]，得到了最发达国家中一些基督教的、进步的或家长作风的私人雇主的仿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国家的立法和制度中，出现了最早赋予劳动者以带薪休假权利的文件。第一个关于劳动者闲暇问题的国际会议是 20 年代在国际劳工局举行的。大约 15 年后，带薪休假问题被列入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议事日程。1936 年，约有 12 个欧洲国家拥有关于带薪休假权利的立法。这一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秘书处国际劳工局的专家们起草了一个国际公约，协调这些国家在带薪休假方面的社会实践。这就为把这一社会措施扩展到 60 来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带薪休假的第 52 号国际公约。这个规定每年至少要有 6 天带薪假期的国际公约，在当时是远远领先于时代的。这一社会革新很快改变了旅游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性质^[5]。同年，即 1936 年 6 月 20 日，由于负责闲暇和体育的卫生副国务秘书莱奥·拉格朗日的努力，法国众议院以 563 票赞成，1 票反对，通过了建立带薪休假制度的法律。正如贝基诺·卡塞莱斯指出的，“国家的所有这些议员们，是否都意识到了他们完全改变了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投票的历史意义呢？今后，劳动者的生活不再被分为两个时期，先是生命初期的就学阶段，然后是辛勤劳作的整个一生。今后，劳动者也有消遣的权利。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立法者第一次

有了另一种对人的看法，他们承认人有休息的权利，所有人都享有在没有金钱约束的情况下自主支配12天时间的权利”^[6]。

当时的民众文学和报纸也都描写了在很多国家里带薪休假和暑假是怎样变成一种习俗的。由于铁路实行车票减价，几百万受薪者和他们的家属得以外出旅行。面对这一社会变革，这些受薪者必然要想象旅游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旅游设备还不能接待所有人，除了个别的例外，大部分享受带薪休假的人，只能去乡间或海边父母或朋友家里呆上几天，而且很少有呆很长时间的^[7]。

此后，旅游的发展令人惊叹。经济危机也未能使它的势头减弱，1973年后同样如此。但是，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所涉及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而且在于它体现了人性的一大进步。正如世界旅游组织一份研究材料^[8]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要衡量它的真正意义可能为时尚早，因为这需要对一代以上的人进行观察。然而，已经得到证明的是，用于度假的时间，平均要比用于消遣和空闲时间的其他活动，如搞卫生、吃饭、睡觉等非劳动活动的时间增加得快。而假期时间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对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旅游和假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

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旅游可以被定义为“所有与生活环境和节奏的改变相联系的暂时、自愿的旅行现象，它还应当同个人与所参观的环境，即自然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的接触联系在一起”^[9]。

2. 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如上所述，假期和旅游是同劳动时间以及上下班交通这些不得不付出的时间的减少以及空闲时间的增加相联系的。实际上，度假的时间和权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当时的个人和群体面对集体权力时的关系的结果，这种权力是从个体的联合中产生的，它致使每个人把自己或多或少的一部分责任交给集体去承担。迄今为止，这种权力的行使一方面是针对它所征服并管理的群体，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每个人的活动，而且还要采取日程表、亦即安排时间的方式来实现。通过日程表来控制时间一直是规范人们行动的一种特殊手段，曾有人说，掌握了时间就是掌握了世界……正因如此，从历史文明的初期直至本世纪前半叶，这种权力无可非议地得到了行使。带薪休假使人们合法地打开了日程表垄断的缺口。“在人类文明史上，带薪休假和享有空闲时间的权利第一次把自由支配一段时间的某种可能性归还给了个人，这一段时间重又成为个人的，而不再是集体的了。这

或许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了”^{〔10〕}。

今天，空闲时间是相对于与它对应的劳动时间而言的，在劳动时间里，投入的生产力按照规定的节奏和效益标准生产出实物和劳务，而生产者往往并不知道他所生产的整体是什么。这样一种划分，即空闲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二分法，来自对时间的线性理解，即可以按照个人的愿望，对时间进行分割和组织。

这种线性时间观是近代的：它直到 17 世纪才在西欧出现，当时，惠更斯在伽利略发现了钟摆运动规律后制造了第一台复摆钟。后来，是康德超越了静态和动态的时间观念，从而创立了纯数学和纯粹的自然科学。线性时间观于是迅速传播开来，而这正好适应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二 对空闲时间的认识

1. 时间概念的历史演变。15000 年前，在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建立在观察月相基础上的记时制度，从一些岩画上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记时制度。然而，这种记时并不意味着对日历的控制。日历是随着农业的出现而出现的。农业要求提前几个月作好安排，并按照确切的程序去完成一系列复

杂的劳动，以取得一个遥远、却从无把握的结果：收获。

时间不再纯粹是被动地接受的和已经安排好了的，它第一次成了一种控制的对象，第一次成了男女之间进行劳动组织的对象。同时，由于冶金业和金属加工业的发展，人们发现，他们可以掌握并改变时间的进程，加速并控制自然的过程，以便更快更好地制造出物品来。

根据衡量劳动时间的最新研究，在当时，以及在今天那些所谓古代社会里，每天平均劳动时间不会超过4小时。其余时间用于打猎或钓鱼这些并不能确保生活基本需要的消遣活动，或用于聚会、饮酒、吸烟和为了准备打仗而绘制假面具。

向定居农业的过渡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之间的关系。首先，人们发现，在适应自然和季节节奏的同时，需要对时间有更好的认识和把握，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植物生长周期的全新的神秘联系：肥沃的概念和多育概念；人还参与到了大自然从生到死再到新生的过程之中。在当时，这种新的循环性的时间被分割为对人类精神而言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后者主要指的是劳动时间。相反，神圣时间则是指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宇宙时间，人们或通过将劳动和使

劳动神圣化的宗教仪式融为一体，或通过在节日和叙述人神感应的神话中使劳动显示出新的价值而参加到这样的时间中去。但是，对时间的这种最初的控制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人们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而不是眼前利益的异化劳动。

正是在这时候，那些伟大的古代文明才开始发展起来。权力机构通过强化对时间的规划确保自己的控制。由于它掌握着对时间的安排，它所组织的那些节庆活动使人们更容易集体进入神圣的境界，并且因为这样做提供了一种发泄方式而得以驱除暴力和疯狂的行为。节庆活动将劳动时间间隔开来。正因如此，在中华帝国时代，皇帝每年年初、或登基之初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制订皇历。

“前伊朗文明是最早引入线性时间观的文明之一。在查拉图斯特拉、密特拉、伐楼拿以及后来的佐尔文的宗教信仰中，时间被看作是一切事物的本原。“神圣”的历史不再是循环的和周期性的，而是有始有终，因为在时间的尽头，邪恶将被最终地驱除。然而，却是从犹太传统起源的基督教迫使人们接受了新的连续的线性时间观。上帝不再置身于时间之外……为了推行这种宗教观念，约 900 年时，天主教会力图建立西方最后一个庞大的神权政治组织，它强

行控制时间，使寺院、继而使农村、最终使城市都随着教堂的钟声和各种日课或季节性祭祀的节奏行事^{〔11〕}。

文艺复兴后，随着教会宗教权力为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所取代，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革。神圣的线性时间并没有消失，但它却非基督教化和世俗化了。这将导致工业新纪元的诞生。此外，还应强调意识形态、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因素，例如新机器的出现使测量时间成为可能（滴漏、钟和装有擒纵机构的手表）。于是，时间被归还给人支配了。正如雅克·阿塔利在《时间的历史》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当时的目标是制订出掌握时间和空间的计划。船钟就是 18 世纪英国人为了给他们的工业革命征服更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出资发明的。

“运输和旅行的发展将从所有这些发明中获益，而旅游本身也将成为延续这一时代形成的殖民帝国的习惯做法的政治理由”^{〔12〕}。

2. 空闲时间和‘工业’时间。诚然，工业是在时间解放的运动中飞跃发展的，然而它又自相矛盾地设制了新的约束。正是用于工业的机器，赋予时间和时间安排以新的效益规则。随着工业的兴起，每天的劳动时间猛增到 15 小时，甚至 17 小时，而且没

有假期。在人类历史上，时间首次仅仅被定义为世俗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一切自由支配时间和一切神圣的时间都全然消失了。1778 年，为了阻止酗酒，法国曾要求取消星期日并投票通过了这一动议：从劳动风气着想，必须向休息作斗争，那是堕落和懒惰的渊藪。法国大革命时，甚至企图取消节假日，因为那是‘商业的敌人’。

然而，这种工业时间却将在两种影响之下很快发生演变：一方面是工人的要求，早在 1866 年，国际劳动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把每天工作 8 小时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一部分雇主义识到，如果合法地组织劳动，照顾到工人体力和心理上所必要的间歇和休息的话，效益将会更好。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随着每周工作 40 小时并开始带薪休假，出现了不再是用于恢复体力的真正的空闲时间，这段时间是足够长的，所以每个人对此抱有一种积极的充实自己的态度⁽¹³⁾。

今天的情况似乎表明，这种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的演变已接近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将发生某种新的情况。在劳动时间与空闲时间的关系中，量变将会产生质的飞跃。首先，空闲下来的时间似乎可以再被划分成好多种类型：

——必须付出的时间，例如，交通和行政手续所